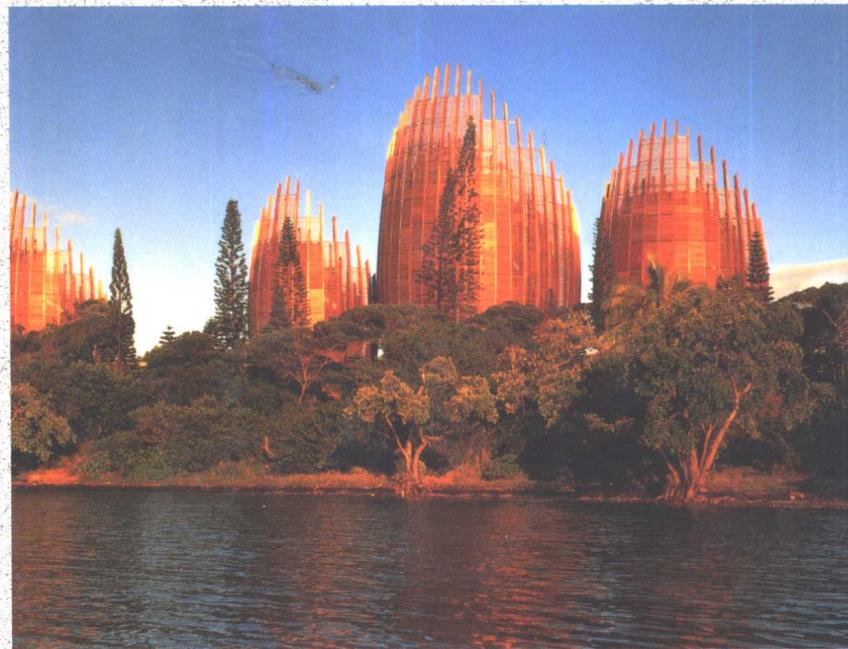


总主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本卷主编: 林少伟 J·泰勒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10卷 东南亚与大洋洲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年 ~ 1999年

第**10**卷 东南亚与大洋洲

总 编 辑: K·弗兰姆普敦

副总编辑: 张钦楠

本卷编辑: 林少伟 J·泰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10): 东南亚与大洋洲 / K·弗兰姆普敦总主编, 张钦楠副总主编, 林少伟, J·泰勒本卷主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ISBN 7-112-03708-5

I. 20… II. ①弗… ②张… ③林… ④泰… III. ①建筑艺术—东南亚—现代 ②建筑艺术—大洋洲—现代 IV. TU-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1442号

责任编辑: 王伯扬 张惠珍 董苏华

装帧设计: 黄居正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10卷 东南亚与大洋洲

总主编: K·弗兰姆普敦

副总主编: 张钦楠

本卷主编: 林少伟

J·泰勒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20

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880.00元 (共十卷)

ISBN 7-112-03708-5

TU·2852(900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1999

第**10**卷

东南亚与大洋洲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年~1999年

总编辑: K·弗兰姆普敦

副总编辑: 张钦楠

第10卷 东南亚与大洋洲

本卷编辑: 林少伟 (William S.W.Lim)

J·泰勒

中方编辑: 张钦楠

本卷评论员:

东南亚

曾文辉(Chen Voon Fee)

何刚发(Richard Ho)

S·朱姆赛依 / D·布纳格

F·马诺萨

Y·萨利雅

B·B·泰勒

大洋洲

P·J·哥德

A·梅特卡夫

R·米拉尼

N·廓里

R·沃尔登 / J·嘉特丽

翻译(英译中): 张钦楠

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 1900年~1999年

丛书顾问委员会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瓦西里·司戈泰斯，国际建筑师协会秘书长
叶如棠，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周干峙，中国建设部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良镛，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谊，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委员会主任
刘慈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

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K·弗兰姆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副主任：张钦楠，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常务委员会

J·格鲁斯堡，阿根廷国家美术馆馆长
长岛孝一，日本建筑师、作家
刘开济，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罗小未，中国同济大学教授
王伯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W·王，德国建筑博物馆馆长
张祖刚，中国建筑学报总编辑

委员会

Y·P·格尼道夫斯基，俄罗斯建筑家联盟主席
关肇邺，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R·英格索尔，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意大利分校教授
V·M·兰普格涅亚尼，瑞士高等理工学院教授
H·U·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
U·库特曼，美国建筑学作家、评论家
威廉·S·W·林，新加坡建筑师、作家、教授
R·梅罗特拉，印度建筑师、作家
J·泰勒，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教授
郑时龄，中国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

王伯扬
张惠珍
董苏华

装帧设计

黄居正

本丛书是由中国建筑学会(ASC)在国际建筑师协会(UIA)支持下结合1999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而组织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贺词

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

我们世纪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速度。通信、技术发展、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哲学观点的演变等，无一不是在高速进行。与其它行业一样，建筑学也受到这种经常性的变革愿望的影响。

20世纪的头10年就看到建筑学与过去的决裂，寻求能代表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意志：理性的、工艺的、纯粹形式的和运动的精神。很多人写到国际主义，承认它是时代的特征。全世界的评论家都欢迎把这种新的建筑学引入其地方条件：人控制着自然，他认为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手段，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他，直至他遇到了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会带来了新的途径。新的形式以新的表现主义成为一种象征，被破坏的城市的重建促进了人类理想的重新表述。人们对工艺技术的极端称颂成为对未来形象的描述。新的结构系统被采用来开拓幻想。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美好未来应当从传统出发。现代运动的乐观主义被一种更为现实的宇宙观(Weltanschauung)所替代，虽然不那么理想，却更接近于普通公民的观点。

在60年代，现代主义被宣布死亡，后现代主义出现。现代城市被责怪为破坏人际关系的罪孽，人们又倾向于以传统街坊为基础的新理论。历史类型的重新出现成为寻根的答案，不论是硬搬的或阐释的。奇异的空间、古典的语言或社区的参与设计决策等都是后现代的主张。

但是也有一种演变其前任现代运动语言的向前看的观点，雕塑形式、巨型结构和高技术等，都是反对历史主义的立场。前者从过去寻求解答，而后者则试图探索未来。

解构主义和批判地域主义等批判性学派正在终结这个世纪。前者以激进的方式给现代建筑语言赋予新的意义。后者则试图在地方文化和国际影响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我们希望本集锦所收集的作品将会通过对一个共同语言—国际风格—在无可重复的地区应用中的不同阐释向有兴趣的读者提供20世纪全球建筑创作的丰富多彩和广阔途径。



萨拉·托佩尔森·德·格林堡
国际建筑师协会的现任主席。
1996年被命名为本年度的墨西哥杰出妇女。

她作为格林堡与托佩尔森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为私人客户设计实践之外，还设计了住宅、工厂、教育、文化和低收入户住房等公共建筑。她在过去25年内是阿纳瓦克大学教授，从事建筑史的教学并指导建筑和城市设计。

在1998年5月，她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她是墨西哥建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加拿大皇家建筑师学会和尼加拉瓜与委内瑞拉建筑师学会等的名誉资深会员。她被阿纳瓦克大学授予杰出学术奖。还荣获1996年的克鲁兹专业成就奖、1996年的为表彰妇女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中成就的扎吉尔奖。

她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建筑系。

贺词

国际建筑师协会秘书长

瓦西里·司戈泰斯

瓦西里·司戈泰斯

1934年出生于希腊雅典，1957年毕业于开普敦大学。随后即开始个人的建筑实践，设计的项目包括公共、工业、商业、娱乐、医院建筑和旧房改造与景观建筑。他曾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希腊分会主席(1981年~1993年)、第二大区副主任(1990年~1993年)，并从1993年起担任其秘书长。他是许多建筑师学会，如澳大利亚(RAIA)、俄罗斯(UAR)、菲律宾(UAP)和哈萨克斯坦(UAKI)的名誉资深会员，欧共体关怀残疾人委员会委员(1989年~1993年)、希腊森林协会和斯巴斯的克斯协会成员。



当中国建筑学会提出要出版一套包括本世纪内1000个建筑的10卷本丛书时，它看来像是件赫丘里士式的工作。也确实如此。同时，它又使人向往。面临各种困难，依靠忠诚、毅力、知识和鉴赏能力，它终于成为现实。这确实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通过本丛书，世界建筑以超越地理和文化的高度得到展示。当人们对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建筑进行对比研究时，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教育。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传统的逐步削弱，以及超民族建筑的影响加大。这种平均化的趋势又使地方文化的认同性重新抬头。这些趋势在本丛书中都有明显表现，使我们产生一种愿望，希望在现实的、全球化的、进步的建筑媒体和不可或缺的建筑遗产之间能维持一种更为平衡的共处。

本丛书所选的许多项目多年来已成为美学的教材。通过这套丛书，它们将在更多的读者中继续发挥此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列举远超过1000个项目。我们既拥有无数优秀的个体建筑，也拥有大量的优秀的群体建筑。它们都为未来指点了方向。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成为本套《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的启动点绝非偶然。北京是正确时间的正确地点。在本世纪终了的时刻，它试图总结本世纪的建筑学，与大会的主题《21世纪的建筑学》正好呼应。

本丛书可以作为学者、学生和建筑师的参考文献。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面向公众舆论。我们希望本套丛书将超越我们的专业圈子。丛书的表达方式可以延伸到外行并与他们对话。如果它做到这一点，而它肯定能做到，那么它还可以推动公众舆论，促使公众更能接受高品位的建筑。只有一个有建筑鉴赏能力的公众，才能使我们的环境建造能达到我们规划设计的标准。

我们要感谢中国建筑学会，感谢K·弗兰姆普敦、张钦楠和所有对本丛书作出贡献的人们，感谢他们为丰富我们对本世纪建筑的知识所提供的这样一套出版物。

我们展望前面的成功旅程。本套丛书将继续得到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全力支持。我们深信它将为建筑界提供卓越的服务。

贺词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叶如棠

20世纪世界建筑的一个纪录

为了配合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北京的召开，中国建筑学会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的支持下，荣幸地向世界各国的建筑师们奉献上这套10卷本的《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作为本世纪国际建筑师丰硕业绩的一个历史纪录。

为了更好地反映本世纪建筑创作的发展，我们荣幸地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教授、知名的建筑评论家K·弗兰姆普敦先生为本丛书的总编辑，同时聘请了对各卷所覆盖的地区熟悉的专家担任编辑。整套丛书选择1000栋建筑(或建筑群体)，通过每卷5~9名评论家的推荐和投票按五个时期(本世纪每20年为一期)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深切地理解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每个建筑师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在书写和阐释着历史，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反映他(她)的时代、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特征。因此，20世纪的世界建筑也就是一份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史的纪录。我为我的前辈和同僚们所作的杰出贡献感到骄傲。我相信每一个接触这套丛书的人都会有同感。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进入史册。尽管发生了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地域性战争，人类终于认识(或开始认识)到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为持续发展共同努力的必要性。

在20世纪中，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各国从工业革命进入到信息革命的时代，也为许多新的建筑流派，建筑类型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越来越具有某种全球化的趋势。但与此同时，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国原有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也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新的诠释。本世纪各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带有全球性特征的科学技术与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发展是完全可以并驾齐驱的。多种民族和地区的多元建筑文化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尽管我们知道，本丛书所选择的一千栋建筑只能是20世纪各国建筑师创作的极小部分，我们仍然相信，在众多专家们协力下产生的这套丛书，可以成为基本反映本世纪世界建筑成就的一份有价值的纪录。通过它，人们可以更加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纪元，开创新的辉煌！

叶如棠



中国建筑学会现任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他于1940年出生于中国宁波，196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其后，他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其作品包括住宅、学校、剧院、旅馆、医院和会议厅等。1985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他致力于改革中国建筑师专业实践，推行了从院校教育评估到注册考试的完整体系。他还负责建立了中国近期建筑遗产的保护名册，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建筑学会于1996年赢得了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北京举办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委托。他在1996年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并先后被香港建筑师学会、日本建筑学会、美国建筑师学会选为名誉资深会员。后者在1998年还因他对世界建筑师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授予了主席奖。

总导言——分区与提名的方法

总编辑

K·弗兰姆普敦

K·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文物保护研究生院的威尔讲座教授。他是许多知名的建筑理论和历史著作的作家，其著作包括：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985, 1992) 和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 edited by John Cave (Cambridge: MIT Press, second printing, 1996) 等。

当我们接近新的千年时，难以想象有比试图对20世纪整个时期内横贯全球的建筑创作做一批判性的剖析更为不明智的事了。这一看似大胆妄为之举，由于我们把世界切成十块巨大而多彩的地域，每块各占大片陆地，在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时间表和政治历史上各不相同，而稍为减轻。

除了庆祝千年转换之外，可以证明此项看似唐吉诃德式之举为有理的一个单一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有多种迹象表明它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后工业社会。这种崛起促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配合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于1999年6月在北京举行20世纪最后一次大会而宣布此项出版计划。

尽管在此项百年评介之举的后面有着多种动机，作出编辑一套世界规模的精品集的决定可能出自两个因素：一是感到有必要把中国投入世界范围关于建筑学未来的辩论之中；二是以本世纪初外国建筑师来到上海为开端，经历了一个世纪多种多样又举棋不定的折衷主义之后要重新振兴中国自己建筑文化的愿望。

在把世界划分为10个洲级地域后，我们的方法是为每一地域选择100项均衡分布在本世纪中的典范建筑。原本的目标是每20年选20项，每一地域100项重要作品，全球整个世纪选1000项。然而，由于在本世纪头25年内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在有的情况下需要把前20年的分配数让出一半左右给后来的80年，从而承认当“现代时期”逐步降临时世界各地技术经济发展初始速度的差异。

10个洲级地域的划分如下：1.北美(加拿大和美国)；2.南美(拉丁美洲)；3.北、中、东欧洲(除地中海和俄罗斯以外的欧洲)；4.环地中海地区；5.中、近东；6.中、南非洲；7.俄罗斯—苏联—独联体；8.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9.东亚(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10.东南亚和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梅尼亚和其它太平洋岛屿)。

这一划分一旦取得一致，接下来就是为每一卷确定一位编辑，其任务是监督选择过程并撰写一篇论文，对本地区的建筑设计做一综合叙述。这篇论文的目的除了作为对本地区建筑文化演变的总览之外，还期望对在评选过程中由于意见不同、疏忽或偶然原因而难以避免的失衡做些补救。评选由每卷聘请的5~8名评论员进行，他们是建筑评论家或历史学家，每人提名100个典范作品，由编辑进行综合后最后通过投票确定。

我个人的贡献可以视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这种人为的地理分割和其它由于这一程序所必然产生的问题进行补救。然而，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必须说一下一项在总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有争议的现代建筑和一项似传统建筑之间的区别。后者承认现代化，但主张以某种措施考虑文化延续性和抵抗性，因此而被视为“反动的”。这样，人们会发现各卷之间选择的项目在性质和组成上有甚大的不同，不论是在设计思想上，或在表达时代的技术和社会特征方面。

在这传统和创新的演示之外，另一个波动是更难解释的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不同建筑表达模式，它们不仅在其强度上不同，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势力或运动的存在时间也大相差异。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芝加哥的草原风格为例，它从1871年的大火到1915年赖特设计的Midway Gardens之间是连续发展的，但其后这一地方运动就失去其劲头和方向；与此相反的是南加州家居发展的长得多的轨迹，它从1910年欧文·吉尔设计的道奇住宅开始，到60年代最后一座案例研究住宅为止，佳作延绵不断。同样，我们可以

提到德国在1905年~1933年间特别丰产的时期，以及在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同一时期的状况，其发展一直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也可注意到：这两个国家对激进现代建筑的培育离不开国家作为进步现代力量的概念。类似的意识形态上的民族文化轨迹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的特定时期上也可看到。

我们还可以看到与结构工程学相关的文化如何因时因地变化，在某个国家其技术潜力和优雅可塑达到特别高超的程度，而另一国家尽管掌握其普遍原理，却逊色甚多。于是，在1918年至1939年间的法国、瑞士、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可见到真正出色的结构工程文化，尤其是在钢筋混凝土领域，而英美国家在同一时期内却只有最实用主义的构筑形式。在英国，唯一的例外是工程师E·欧文·威廉斯的工厂建筑和丹麦流亡工程师奥雅纳的作品。在美国，在混凝土领域的例外案例是巨大的水坝，特别是在田纳西河流管理局以及在科罗拉多建造的巨石坝。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技术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大为不同的，至今，还有前工业文化，乃至前农业、游牧、部落文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生存下来。同时，有组织的建筑产业连同建筑师职业实践在许多国家仅仅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这种前建筑师的建造文化，B·鲁道夫斯基在他的1963年出版的书中用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标题。今日在所谓第三世界中却出现了扭曲的反响，在这里的许多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自发移民的集合，在自占的土地上，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也就是无水、无电、无污水处理等人类密集居住场所为健康生存所必需之物。对此，我们得承认一项严峻的事实，这就是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建造量的不足20%才是由职业建筑师所设计的。

从无处到有处到更远

本卷编辑综合评论 东南亚
林少伟(威廉·S·W·林)

林少伟

林少伟生于1932年，从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AA) 毕业后，在哈佛大学城市与地区规划系以富布赖特基金会奖学金进修。他是新加坡籍，其专业为建筑学、规划学和发展经济学。他是W·林事务所主要负责人。该所的宗旨是更新观念和卓越设计。他曾就建筑学发表方向和亚洲城市问题等多项主题写作和演讲。他的5部作品是：

* Equity and Urban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SEAN countries and Singapore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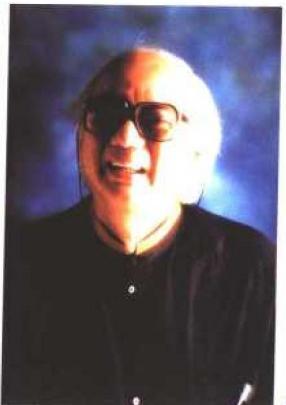
* An Alternate Urban Strategy (1980);

* Cities for People: reflections of a South East Asian Architect (1990);

*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evoking traditions in Asian Architecture, co-author with Tan Hock Beng (1997);

* Asian New Urbanism (1998)

林少伟除Contemporary Vernacular外，其它均为文章和演讲的汇编，涉及问题广泛。目前，他是亚洲AA的主席，《团结》(马尼拉的一份关于现代事件、观念和艺术的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他还是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RMIT)的兼职教授。



导言

在20世纪初期，东南亚已完全沦为殖民地。政治边疆由西方强国任意划定，丝毫不考虑历史、文化和种族等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本地区经历了由稳定确立、相对开放、能灵活应变的社会沦落为受剥削、压制和征服状态的转变。只有泰国，由于法、英间的矛盾和本地人善于利用其矛盾的机智而得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独立。

码头、铁路、公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如电报电话等，均随着庄园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引入而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新经济所需要的金融和商业服务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严重加剧了种族隔离。在殖民主义的城市集居点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不均。殖民势力几乎完全控制了现代经济，并统治着大城市的主要部位。西方人居住在精心选择的舒适而隔离的地点。I·苏德拉贾特在其对荷兰占领区的批判评价中写道：“印地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成为殖民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建立控制、管理各项活动和在城区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和美学水准而服务……20世纪初在印地的荷兰殖民城市是文化多样化的‘容器’，在这里，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享有各种利益，而下层人民则通常机会短缺、地位低下，又没有政治发言权。”¹

在殖民时代，前殖民地中的传统被冻结了。更糟糕的是，在任意干预下，它们往往被修改或增加以满足某些殖民主义者的功能、意义或美学表现上的胃口。B·岳(译音)在其近作《Contesting Spac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ingapore》一书中写道：“殖民主义不只是简单地施加政治和经济强制，而且还实施思想和文化侵略。殖民主义的遭遇往往采取一种仪式化的形式，靠某种观念、体系及实践的输出来维持，以排挤本土形式或以殖民势力的形象来重新塑造。”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中，东南亚的国家相继取得独立，有的是在殖民者撤走之后和平实现，如马来亚和菲律宾，有的则经过悲剧性的残酷斗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冷战的不幸牺牲品。这些国家经受了半个世纪的巨大波动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被一种极其血腥的战争和破坏所吞食。

除了一些微小的边界线调整以及至为重要的南北越统一外，本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线异常稳定。因此，不奇怪的是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在致力于解决其内部的多种族、多文化和多种宗教信仰的问题。

199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庆祝成立30周年是一个分水岭。它决定扩大成员以包括老挝和缅甸。通过最终实现“东盟10国”——只有柬埔寨的盟籍被推迟到它选举后再定——东盟最终包括了地理学家所确认的整个东南亚。东盟将在互利的原则上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它的政策和活动将对外部国家和自己产生重要影响。

10个东盟国家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的国情迥异——土地面积、人口、人均收入和经济发达程度等。³然而，这些国家却有很多共同点，有许多它们共享的经验，包括：从亚洲各地区传来的多世纪的文化、强加的西方统治(除泰国)、列入“另册”的现代化以及共同的气候特征。这些区别和共同点在每个国家的城市与建筑中得到反映。

在西方，现代化指的是先在欧洲后在美国发生的一种转变的历史过程。现代性是以希腊—罗马传统为基础，随后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发展到工业革命

及其后的产物。

从历史上说，西方世界生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和初始的发展动力，以及近来迅速变革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人们可以理解许多西方人对此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感。对很多人来说，不论他倾向古典或现代，亚洲建筑都显得过于装饰化，甚至是华而不实的。其陌生的设计原理和美学规则只能使它们被方便地排斥在正统的建筑论述之外。G·B·纳班托格鲁，一名土耳其学者写道：“在不平等的殖民者与被统治者的遭遇中。我不得不回到维特鲁威的传统，这种西方建筑理论控制了识别建筑的所有界限。”⁴弗莱彻在他的著作中毫不隐讳地把非西方的建筑列为非历史风格。这个“非”字意味着欠缺。按弗莱彻的说法，“历史欠缺的风格的标志就是过分的装饰化”。

长期以来，主要从欧美来的历史观点是，东南亚只是多种文化影响的一个交汇点，它的文化来自亚洲邻邦，特别是北面的中国和西面的印度乃至更远。从来没有人认真考察过处于这种遭遇下的本地文化的意义和性质。

在近三四十年间，出现了对东南亚文化的阐释。按C·阿森的说法：“最重要的，并且正在不断被探讨和接受的，是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它们的文化发展有其本土的基础：它们不全是，或主要地不是派生的、外来因素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交流’。”⁵换句话说，所谓“软”文化，也就是说东南亚的本土文化，不能简单地在它们多世纪来所经受的更强大、更咄咄逼人的外来文化面前被否定为自然臣服者。事实上，这种文化已经证明了自己在长期的对立和压迫下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

建筑师S·朱姆赛依以杰出的学术性在他的著作《Naga-Cultural Origins in Siam and the West Pacific》中推论，东南亚是水生文明的发源地，其记忆至今还流行于人民的精神意识中。这一文明的建造纪录是非永久性的，它的人口经常流动，并总是住在水边。我在此引述他的话：“广义地说，地球上只有两种文明：一种本能地是以受拉材料为基础的，另一种则以受压材料为基础。前者产生于水上技能和求生本能。在需要时只在最少辎重下流动。”⁶

今日，迫切需要以其本身条件来审视东南亚，以提供从亚洲角度重新阐释它并承认东南亚文化的内在力量、复杂性和特征的智能空间。我们需要克服那种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念。同时，我们应当泰然地接受当代现实，共享其现代性，包括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的社会。

20世纪东南亚建筑不可能轻易地以系统的方式评介。以完成时间来排列和介绍被选择的建筑不可能代表或反映这些社会的复杂织锦。这些国家由于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步伐不一，使其建筑经验有巨大的区别。其它重要因素包括反殖民主义斗争、冷战中的意识牵涉、政府智力素质以及政治领导人的献身精神和工作能力。

关于东南亚建筑史的研究和印刷品为数很少。在地区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仅仅开始。在本文中，我将试图以对各国在时间上有所交叉的条件下将它的建筑史分为四个时期，即：1.晚期殖民主义时代；2.英雄主义和认同性；3.大都市的主导地位和当代乡土性；4.当前的危机和前景。

1.晚期殖民主义时代

本地区的单一统一因素是这些国家在1900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之间的晚期殖民主义的共同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经济大衰退对本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殖民主义仍然按其传统方式继续其统治，只做了微小的调整。有两位本地出生的作家在《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chitecture》一书内对新加坡作了如下的描述：“两次大战间的日子出乎寻常的平静，标志是殖民官员和欧洲移民与亚洲人在社区上隔离，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日益表现出一种傲慢、自满和盲目态度。在多数情况下，它表明帝国正逼近黄昏，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粉碎。”⁷西方在知识和种族领域中的傲慢态度继续在社交关系和对被统治者文化的观念中表现出来。

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公共、机制和商业建筑都由西方建筑师设计，展示了新古典主义的最终光辉。在殖民城市中，西方对重要公共空间的美学统治表现为提供一种无可挑战的强力的心理象征。按W·克拉森的说法，菲律宾是唯一的例外，因为美国人执行了一种“慈善同化”的政策，特别是在教育、卫生领域和提供特别需要的基础设施方面。⁸年轻的菲律宾建筑师从美国回来开业，其中最知名的是J·阿雷拉诺，他设计了新古典主义的马尼拉邮政局(1926年)和装饰艺术的大都会大剧院(1931年)。

然而，当时亚洲的私人资本开发不在这一地区，而是在上海的外滩和孟买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滨海道。但是，这些建筑中的优秀者即使是外人设计的，仍然在本地区的建筑遗产中值得取得一席之地。由J·德布阿和L·肖松设计的柬埔寨金边的新中央商场就是一例。B·B·泰勒认为，这栋建筑是“亚洲20世纪早期伟大的现代房屋之一，但是它的杰出品位——甚至它的存在——都没有受到注意，因为它建造于1937年。”⁹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由M·庞特设计的杂交风格的万隆理工学院(ITB)礼堂(1920年)和由W·休梅克设计的令人振奋的装饰艺术风格的伊索拉别墅(1933年)，以及由斯旺与麦克拉伦事务所设计的新加坡火车站(1932年)。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泛亚洲范围内的研究文件，以纪录由西方建筑师在此时期内设计的重要项目。

泰国的皇室和在有些场合下大马半岛上的保护国对自己的官室和宗教建筑显示了独立的审美倾向。他们培植了一种适合自己爱好的杂交建筑风格，两个泰国的例子，包括一项闻名的杂交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即大皇宫(1882年)中的Phra Thinang Chakri Maha Prasat和威曼美克皇宫(1901年)。

马来西亚的乌布迪亚清真寺(1917年)是取材于北印度莫卧儿建筑的一个范例。它是由英国殖民行政官所引进的，因为他对殖民前的英属印度的本土文化熟悉了解。另一方面，肯南甘宫殿(1931年)，现为马来西亚瓜拉江沙的霹雳省皇家博物馆，它的设计则考虑适应统治者的个人生活方式。为此，该宫殿采取了马来本土的乡土设计构造和非传统屋顶的强有力混合手法。

在欧洲的战争年代中，关于现代建筑的学术讨论这一巨大的活力在继续。主要的活动有1931年的雅典宪章和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此时期内，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学校，如德国的包豪斯和其后伦敦的AA建筑学校。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和格罗皮乌斯与其它人通过其著作和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造了许多实验性建筑，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并进行了批判性讨论。然而，现代建筑在东南亚的影响微弱，只有少数不很知名的建筑是以现代手法设计的。有意义的例子包括在菲律宾的由P·安多尼奥在30年代晚期设计的远东大学，在新加坡的新加坡改进信托基金会公寓(1936年～1941年)和卡朗机场(1937年)。这种影响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见之于马来西亚的联邦大厦(1954年)、新加坡的亚洲保险公司大楼(1954年)和马来西亚的李延年大楼(1959年)。

在1941年之前，本地区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城市结构大量的是在精心管理下以多种乡土及杂交风格建造的2～4层联排的骑楼(商住楼)。这些建筑门面宽为4～6m，进深不一。它们的底层可作多种用途，而上层一般供居住。后来，

有钱人搬到郊区去住，市内的人口密度由于供工人和新移民居住而剧增。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建筑因过于拥挤而败坏。同时，城市中出现了新的贫民集聚区，占据了周围村镇，使城市迅速扩大。有的殖民官员好意地试图改进城市设施并向贫民提供住房。然而，这些措施至多只是些象征性福利，对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和住房危机于事无补。

2.英雄主义和认同性：战后年代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前占领了整个东南亚(除泰国)。战争给经济带来了灾难并使人民经历了长年的困难和痛苦。从这一经验，当地人民理解到殖民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日本占领者和殖民主义的行为一模一样。战后，欧洲强国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一直赖到1949年。法国继续占领越南直至战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自己的紧急问题。多米诺理论由此产生，使东南亚陷入冷战。本地区的知识环境日益受到麦卡锡主义恶梦般的骚扰，特别是在美国干涉越南战争之后。即使是尼赫鲁、纳赛尔和苏加诺等领导的不结盟国家第三势力也未逃脱嫌疑。

在苏加诺总统的“有指导的民主时期”(1957年～1965年)，现代建筑以巨大的信念被作为力量和现代性的象征引入印度尼西亚。现代运动所内在的排斥旧秩序的意识形态适合民族主义的高潮。许多大型建筑和重要民族性纪念碑连同主要公路同时修建。这一建设计划在苏加诺1965年垮台后仍以更大的成熟性和商业主义继续发展。这些建设项目有着前所未具的政治意义，被人们描述为幻想性和英雄主义的。¹⁰可选的例子有：印度尼西亚旅馆(1962年)、苏加诺体育中心(1962年)和图吉·莫纳斯民族纪念碑(1978年)。这些项目类似于泰国銮披汶元帅时代指导下民主时期为曼谷进行的大型现代城市设计，最突出的例子是拉查达姆纳大道的联排房屋(1946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建筑为当局和许多欧美的学校所接受。1951年举办的英国节使现代建筑群众化。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哈佛，密斯主持下的MIT和其它一些西欧的学校成为严肃讨论建筑学的神经中枢。勒·柯布西耶在英国和西欧大部地区被视为偶像。到处建造了重要和令人振奋的项目。新观念不断被探索。对建筑师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兴奋的时期。

许多亚洲的青年建筑师，包括日本的，在50年代及其后在这些先进的院校学习。这样，他们就接受了在建筑和城市学方面不可思议的丰富多彩的智慧性和创造性观念的熏陶。他们得以享受到这一时期大师们第一手的经验传授。东南亚的学生在50年代中期参加了在AA由E·M·弗莱和J·德鲁开设的首届热带建筑学的课程。同时，勒·柯布西耶正与同一班子在设计昌迪加尔。他大量采用了Parasol——一种能防止下面空间受日晒雨淋的悬挑屋顶，和brise-soleil，作为垂直的遮阳板。昌迪加尔、萨伏伊别墅和朗香教堂都成为他脱离过去纯洁时期较为正规的设计和理论的重要作品。¹¹

许多青年的毕业生，带了现代建筑的思想和美学手法回来，这些观念看来都具有全球通用的价值。他们接受了勒·柯布西耶和其它大师们的思想烙印以及当时建筑讨论中最动态和令人鼓舞的观念。这些智慧的激励，加上新取得的政治独立的兴奋，促使这些年轻的亚洲建筑师寻求自己设计的国际合法性。他们在使建筑适应气候特征和文化与认同的阐释方面同样下了功夫。这种英雄主义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选的例子有：位于新加坡的新加坡会议厅(1965年)；位于马来西亚的塞伦班的国家清真寺(1967年)、地质馆(1968年)；位于新加坡的电话局(1969年)；位于泰国的英国文化协会大楼(1970年)；位于新

新加坡的人民公园建筑群(1973年)和金里程建筑群(1973年)；位于泰国的科学馆(1977年)等。

谭柯蒙(译音)在评论1965年建的新加坡会议厅与工会大楼时说：“看来中性的‘热带现代’形象比较适宜于反映新加坡经济和社会过程的现代性……认同性这一恼人的问题对作者的创作和道义良心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关怀的主题……不论是象征性地或工具性地，要阻止表现的封闭性……都会导向认同性问题的提出。”¹²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环境中，1969年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泛亚合作组，称为亚洲规划与建筑咨询组(APAC)。它的成员有日本的槇文彦、长岛孝一；香港的何弢；印度的查尔斯·柯利亚；新加坡的林少伟(威廉·S·W·林)；泰国的S·朱姆赛依等。他们经常会晤以交流经验和观点，并探讨亚洲建筑与城市发展方向。¹³

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有最长的建筑教育史。第一所建筑院校是在1925年建立的马哈斯理工大学。其后泰国在1930年在国家工艺美术学院中建立了建筑学院。不奇怪的是菲律宾的文化环境为L·V·洛克辛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他的第一个设计：圣洁礼拜堂(1955年)使他顿时成名。W·可拉森认为：使洛克辛突然成名并持久富有成就的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毕生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努力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菲律宾的建筑学。不幸的是，他的顽强的亲美思想减弱了他和亚洲同行进行任何认真的学术探讨的机会。他在菲律宾独领风骚几十年，直至1994年去世。¹⁴洛克辛的重要作品包括演艺剧院、文化中心(1969年)、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1976年)和菲律宾国家艺术中心(1976年)等。

在这一时期内，包括学校、俱乐部、旅馆、商业等主要建筑均以强烈的种族和文化形象表现。这些带有鲜明地方文化色彩的现代建筑是对倾向传统的业主的简单化反应。但是，当这种设计手法被用到高层建筑中去的时候，其矫揉做作的象征性就成为滑稽可笑了，如新加坡的C·K·董诗家大楼(1982年)。在此，我们应当肯定H·卡斯图里在提供一种得到公认的、基于种族文化的象征手法方面的努力。这种手法在他的许多建筑中被成功运用，如：马来西亚的鲁什大楼(1986年)和五月银行大厦(1987年)等。尽管人们对其美学和建筑品位有所争议，它们在寻求一种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性方面的意义却应当肯定。

无庸赘言，本地区做了大量寻求认同的努力。我们还必须承认和识别跨文化的影响。东南亚文化和建筑遗产中的织锦性日益被人发现和重新得到欣赏。在1985年，一位印度尼西亚的知名学者索贾特莫科认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建筑认同，如果要求真实而不落俗套，就应当扎根于社会，并且要能反应于社会面临的问题。”¹⁵他还警告说，认同性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永久定型的商品，而是一种经常变动的社会—文化本质。

3.大都市的主导地位和当代乡土性

由于有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政府，新加坡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争取成为像香港一样的全球性城市，以吸引MNC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岛国很快地进行了地位和结构的调整，以取得最大收益。英语取得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核心的小家庭得到鼓励、大型城市再开发得到实施。新加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随后发生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而后是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我们可以特别从主要城市中心的发展中看到这些国家的快速经济和社会转变。日益增长的信心使许多亚洲人克服了产生于过去共同遭遇

的殖民主义统治和经济落后的种种情结。然而，这些国家近期实施的开放往往导致当代艺术、时尚和生活方式咄咄逼人的引进，还带来了好莱坞式的娱乐、垃圾食品和商业化的企业建筑风格。

华尔街和第五大道成了我们城市环境和建筑志向的灵感形象。不奇怪的是当局积极地引入和鼓励国际风格，特别是由那些外国知名的大设计公司所设计的。这些大都市的建筑师带来了自己的观念和情趣，建造了一批与环境文脉无关、对气候漠无兴趣、没有文化参照的建筑。

更有甚者，许多地方设计师甘愿充当次要角色，以学习掌握有关的专业和技术知识，然后能产出同类设计产品。一旦他们从那些大都市建筑师那里学来了施加最新建筑时尚的包装技术之后，他们就可以转而向那些正在兴起的国家出口专业服务。有关初始的智慧和创作能量以及基础性的建筑理论很少被感到需要、理解或领会。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上千栋高层建筑和百万栋投机性建筑在东南亚建成而完全无视基本的设计原则。许多项目运用了传统的形象，如假古典的正面或在高楼大厦的顶上加顶“历史”帽。抄袭重复也广被接受。然而，这些重复过多地并毫无选择地出现，使其原型也失去了其意义。过去的建筑风格被当作档案纪录可以任意掠夺以取得历史合法性。这样，重复在创作过程中就成为创新的取代者。

在这种情况下，由严肃的建筑师所做的有前景的建筑试验就无人问津而受到压制。但微弱的声音和剩余的努力仍然继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例子：泰国的机器人大厦(1986年)；马来西亚的中央广场(1986年)；新加坡的坦平社区俱乐部(1986年)¹⁶和卡姆布吉斯开发(1989年)¹⁷；泰国的民族大厦(1991年)；新加坡的阿比利亚公寓(1994年)；泰国的民族塔楼(1995年)¹⁸和新加坡的海上巡游俱乐部(1999年)¹⁹等。在大批丑恶商业主义和抄袭风格的大型建筑的无情包围中，这些项目几乎是隐身不现的。

一个例外并取得国际许可的是杨经文。杨在他的设计公式中总是要引入一个“生物气候因素”²⁰，如在他设计的美新尼亚加大厦(1992年)。这种气候理性化的形式给他的高层建筑赋予了不同于N·福斯特及其追随者的特性。此外，他还在自己的近期设计的外围结构中引入了各种复杂处理，如上海阿墨里大楼(1997年)和名古屋大楼等。²¹与C·柯利亚、G·巴瓦等不同，杨可能是在日本之外唯一一名被大都市建筑师精英们接受为其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物。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全球文化的一个锚固和砝码。遗产给过去赋予意义，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内在力量和信心。人们开始认真对待传统地区的保护和适应性改造。²²在东南亚国家的遗产保护组织之间日益展开经验的交流和共享。本地区最令人兴奋和成功的两项适应性重建项目是：新加坡的不夜天保护区(1982年)²³和马来西亚的中央商场(1986年)²⁴。二者都是由关心的个人针对有关当局的固定观念从推土机面前及时地抢救下来的。

为了解除殖民主义以后存在的对自我发现的思想障碍，非常必要的是对过去进行阐释并用多元化的手法把它们纳入现代，使它们成为能丰富我们生活的活生生的传统。建筑学中的当代乡土性可被定义为一种自觉的努力，试图揭示某一种对特定的场所和气候条件做出独特反应的传统，并对它的形式和象征认同进行再阐释，从而创造出新的形式，可以反映当代现实包括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不再被视为与现代化过程相抵触的外来物。

公众对东南亚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增长理解加强了对“根”的寻求，并探索如何重建与过去建筑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主要的建筑师正在积极